

◀（上接 9 版）

集成》，据称是当今存世最完整的一套。在梵文文献收集方面，博德林开始时主要依靠牛津大学的东方学教授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在欧洲搜集，成效极为显著。1856 年时，博德林已成为欧洲梵文抄本数量居于第二位的图书馆。19 世纪 80 年代末，博德林又从考古学家郝爱池（E. Hultzsch）处购入 465 种梵文和帕拉克里语手稿，其中有些手稿是极为罕见的写在桦树皮上的文献。在波斯文献的收集方面，博德林也毫不逊色。其中，1844 年购得的威廉·乌斯利（William Ouseley）爵士的 400 件波斯手稿尤为珍贵。在这些手稿中，有一部 1460 年奥玛·海亚姆的《鲁拜集》异常精美。而大约同时期的一部抄本薄伽丘《十日谈》1467 年完成于佛罗伦萨，系插图本，也是精美绝伦，五百多年过去，风采不减。

为了能够聚集更多有价值的珍贵书籍，1925 年博德林成立了“博德林之友”。这是一个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朋友圈”，他们为博德林购买和捐赠了大量的珍贵图书。斯威夫特的《布商的来信》，蒲伯的《论批评》《夺发记》，斯特恩的《项狄传》，斯摩莱特的《蓝登传》，约翰逊博士的《漫游者》《闲人》，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素描》，雪莱的《麦布女王》，汤尼生的《两兄弟诗集》，司各特的《威弗利》，柯勒律治的《克丽丝德蒂》《忽必烈汗》，这些书的初版本，都是由“博德林之友”购买后赠送给图书馆的。其中有些书，像雪莱的《麦布女王》，初版本极为少见，寻寻觅觅将这些书海中的一颗颗金粒找到并汇集，着实难得。

17 世纪的牛津学者安东尼·伍德曾如此评价博德利爵士：“毋庸置疑，托马斯·博德利将与他的国家一样不朽。”博德利的朋友弗朗西斯·培根也赞扬他的图书馆是“将知识拯救于滔滔洪水的方舟”。博德利当然值得赞扬，他创建的图书馆使得大量有可能消失于历史烟尘之中的珍贵书籍得以保存下来，称其图书馆为“方舟”恰如其分。其实，因热爱知识而进入博德林图书馆工作的每一位馆员都值得颂扬。如果没有尼克尔森（E.B. Nicholson，1882—1912 年任馆长）的眼力与魄力，博德林就没有玛格丽特王后福音书（当时只花了 6 镑），也不会有埃及藏经洞中的希伯来文献，更不会有那么多的古希腊莎草纸

文献。如果没有图书馆员斯特里克兰·吉布森（Strickland Gibson）的慧眼，1623 年版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也不可能传奇性地重新回归博德林。此外，牛津本校的学者与牛津的毕业生，也是重要的贡献者。以布尔迪厄的理论分析，他们都是社会诸“场域”中的精英阶层，“社会资本”雄厚，这使得他们能够接触到人类优秀的知识与文本，留下青春印记的母校和图书馆，常常成为他们晚年捐赠书籍的对象。这些人，共同铸造了今天的博德林。

万川归海，学术与收藏互为促进

博德林的藏书，每年都有增长，1885 年时，仅馆藏印刷书籍已超过 40 万册。自 17 世纪初期起，包括博德利本人在内，历任馆长即为扩大图书馆场地而奔波。老博德林图书馆方庭北面，原来是牛津大学出版社所在地 Clarendon Building，为满足图书馆扩充需要，出版社于 1831 年搬离了这幢大楼，还把所藏的萨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藏书捐给了博德林；老博德林图书馆南面的拉德克利夫图书馆，由拉德克利夫爵士捐资于 1749 年建成，系英国第一座圆形穹顶图书馆，以收藏医学及科学类图书见长，但因管理不善，图书馆停滞不前，经过谈判，1862 年成为博德林的阅览室；老博德林图书馆初成立时居于二楼一隅，其底层是牛津大学考试学院，系牛津学生举行重要考试和开办各类讲座的场所，1860—1870 年，经过与校方长期商谈，考试学院在高街上另择新址，原场地也让给了博

德林。后来，博德林还在拉德克利夫阅览室和老博德林图书馆之间的地下挖建了一个地下书库（可藏书 100 万册），并修建了连接二者的地下通道。20 世纪 20 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资 40 万英镑，牛津校方开始在宽街的北面筹建博德林新馆——这就是 20 世纪 40 年代落成的威斯特图书馆。图书馆的持续扩充为来自四面八方的书籍找到了安居之所。

回首遥望，四百年的博德林图书馆确实完美地体现了博德利爵士“建一座学术性公共图书馆”的理想。事实上，博德林图书馆的馆藏书籍真正做到了学术与收藏齐头并进。从收藏方面看，上述提及的很多著名珍本、善本，甚至是孤本，无论是购买，还是捐赠，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牛津大学学者的帮助下获得的。例如，王后学院教授阿奇博尔德·塞斯（Archibald Henry Sayce）是知名的亚述问题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14 年将个人收集、源自卡纳克神庙的 4000 多份陶片捐赠给了图书馆，使后者的陶片收藏称冠全球，为其他学者的研究奠定基础。前述马隆等人捐赠的英国早期英文印刷品，则使牛津成为早期英国文学研究的重镇。事实上，很多馆藏著作可能在图书馆中沉睡多年，而研究者与他们的不期而遇，往往开启一个学术研究新领域。20 世纪 60 年代，尚在剑桥读书的杜德桥（Glen Dudbridge）在博德林图书馆发现了《新锲三藏出身全传》，这部万历年间由阳至和编、福建建阳书商朱苍岭刊印的小说，后来被称为阳本《西游记》，是 17 世纪中后期由乔治·伯克利勋爵捐赠给图书馆的。杜德桥的到来，唤醒了沉睡了三百多年的



馆藏的 16 世纪晚期航海图

阳本《西游记》，他据此撰写了多篇考证《西游记》祖本的论文，并以此作为博士论文论题，后来还出版了专著，收入“剑桥中华文史论丛”。同样是在 17 世纪五六十年代，博德林获得了英国著名海洋法专家、藏书家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的几乎全部藏书。这次难得的捐赠卷帙浩繁，包括大量珍稀文献，既有墨西哥的抄本，又有诸多东方学文献。鉴于藏书数量众多且价值非凡，图书馆专门在汉弗莱图书馆旁辟出空地用于其书存放与陈列，这就是迄今仍在使用的塞尔登角。由于塞尔登个人的知识兴趣，他还收集了不少地图，其中有一幅中国地图。2008 年，美国学者巴彻勒在牛津进行学术研究，偶然发现了这张沉寂 350 余年的地图，他据此撰写了《伦敦：塞尔登中国地图与全球都市的崛

起》（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而时任牛津大学邵逸夫汉学讲习教授的著名汉学家卜正民也据此写出《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Bloomsbury Press，2013）。两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探讨全球贸易的发展，引发诸多探讨与争议。

* * *

博德林图书馆是一座知识的海洋，她是由成千上万名对知识与书籍有着虔敬之心的爱书人共同构筑的知识王国。四百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四面八方的书籍持续不断地汇聚于牛津小城，汇入博德林之海，成就了一座伟大的图书馆，书写了一个又一个士林传奇。在可见与不可见的未来，这种传奇还将继续……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本文撰写参考了 Mary Clapins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Bodleian Library, 2015; Edmund Craster. *History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1845–1945)*. Clarendon Press, 1952; *Trecentale Bodleianum*. Clarendon Press, 1913; C.W. Wheeler (editor). *Letters of Sir Thomas Bodley to Thomas Ja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Thoams Bodley. *The Life of Sir Thomas Bodley*. A.C. McClurg & Co., 1906; Timothy Brook. *Mr. Selden’s Map of China: Decoding the Secrets of a Vanished Cartographer*. Bloomsbury Press, 2013. 本文写作获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图片除注明外，均来自博德林图书馆数字资源）



1588 年的牛津地图。这是博德林图书馆所藏最为古老的牛津地图。